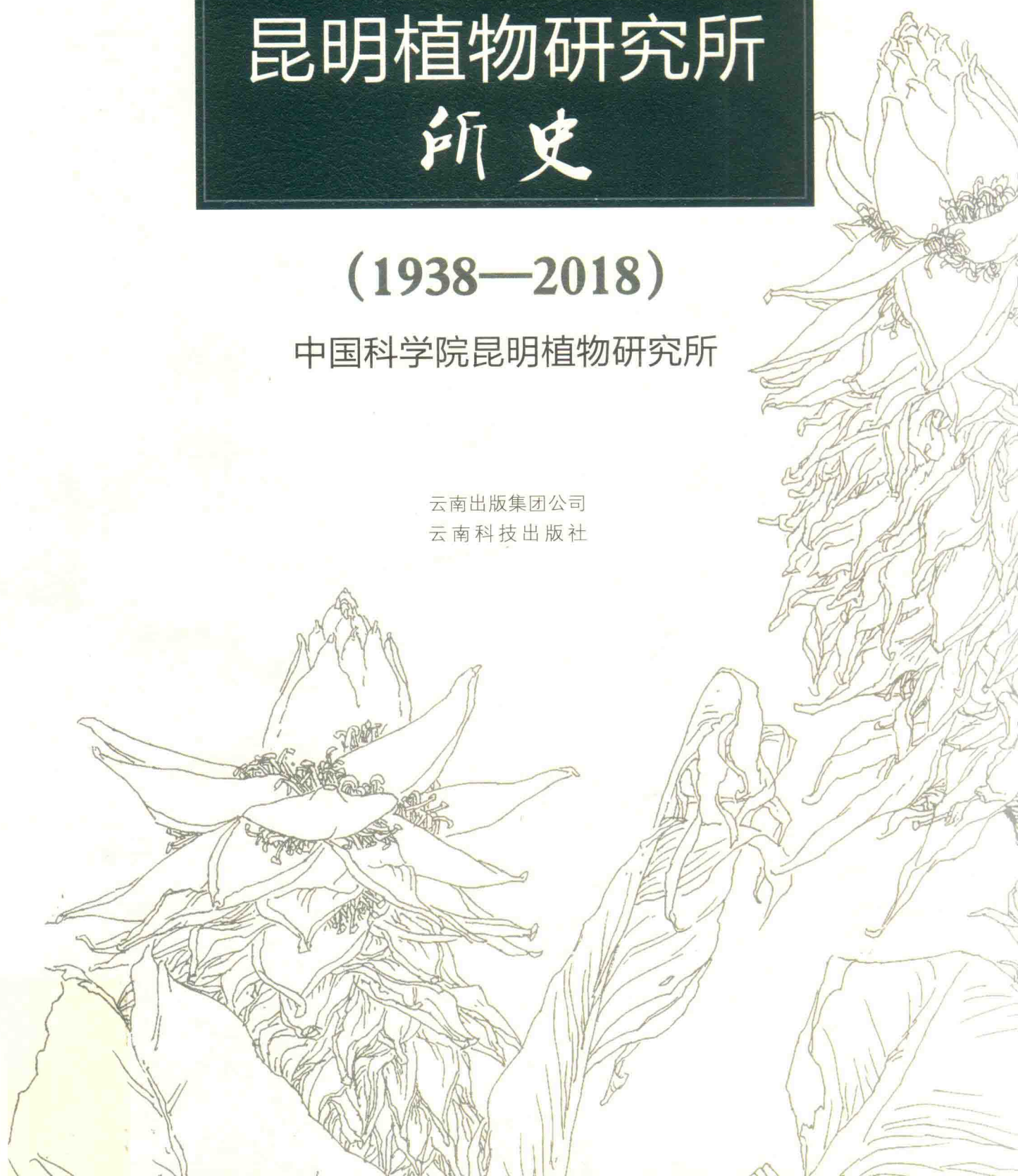


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 所史

(1938—2018)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 所史

(1938—2018)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 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史 : 1938 - 2018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编. — 昆明 :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 - 7 - 5587 - 1044 - 5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科学院 - 植物学 - 研究所 - 概况 - 昆明 - 1938 - 2018 IV. ①Q94 - 242. 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0019 号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史 (1938 - 2018)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编

责任编辑: 王 韬

封面设计: 晓 晴

责任校对: 张舒园

责任印制: 翟 苑

书 号: ISBN 978 - 7 - 5587 - 1044 - 5

印 刷: 昆明市五华区理焯教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43

字 数: 117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0 元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网 址: <http://www.ynkjph.com/>

电 话: 0871 - 6419088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寄
语

序 言

2018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迎来建所80周年华诞。两年前，研究所决定编纂《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史》。初衷有三：一是梳理研究所起步、成长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让后人得到有益启迪；二是从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矢志不渝的事迹中，感悟“扎根边疆，献身科学”的真谛，让理想信念，薪火相传；三是80年历史，栉风沐雨，风雨兼程，有成功和辉煌，也有挫折和困惑，我们从成功和辉煌中汲取正能量，从挫折和困惑中总结教训，团结全所员工，向更高目标进发，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再立新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接收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组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再到成立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历任领导十分珍惜历史整理，重视所史教育。1959年，由“站”建“所”时，一批大学生和高中生入所，蔡希陶在带大家参观的同时介绍所、站发展历史，当时入所职工至今仍印象深刻。蔡老为所史传统教育树立了标杆。此后，凡新入所的职工、新入学的研究生，第一课是所史教育，传统延续至今。

回顾研究所80年历史，深怀感恩之情。1956年，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视察昆明工作站，当即解决“科研用房狭小、科研人员不足、图书仪器稀少”三大困难。在中国科学院和云南省政府关怀下，研究所在元宝山新征地1164亩，建起了三幢品字型科研大楼。感恩党和政府关怀，给昆明植物所带来发展新机。老一辈科学家们在艰苦岁月里，调查植物，采集标本，从编辑植物名录起步，进而编纂《云南植物志》，把云南植物家底摸清楚，直至完成《中国隐花（孢子）植物科属辞典》《中国维管植物科属词典》等重要工具书以及发布《云南生物多样性名录》（2016）、《云南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2017）、《云南生态系统名录》（2018）。感恩老一辈科学家树立“扎根边疆、献身科学”榜样，我们接下接力棒，砥砺前行，沿着老一辈科学家探求真理的足迹继续攀登科学高峰。无论科研骨干还是普通职工，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在所工作的员工，无论是导师还是学生，都为研究所发展添砖加瓦，洒下汗水，付出辛劳。感恩所有员工“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的奉献，研究所发展与每一位“昆植人”都休戚相关。

回顾研究所80年历史，牢记建所初心。所训“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其深意在于“植物既是环境和资源的重要部分，又必用于提供资源，以改造环境”。1963年，吴征镒、蔡希陶、浦代英主持所务扩大会议，提出“花开三带，果结八方。群芳争艳，万紫千红”办所方针，具体部署“两条战线”、“三个战场”和“八大兵种”，建设综合性研究所，开

发利用植物资源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1981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专家组评议昆明植物所，“评议报告”指出：“昆明植物研究所充分利用云南省的有利条件，从摸清云南植物家底及合理开发利用云南植物资源出发，开展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化学、植物生理、植物引种驯化和植物形态解剖等多学科研究，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

改革开放40年来，历经“知识创新工程”、“率先行动计划”、“特色研究所建设”等重大改革进程。2015年3月，研究所提出新时期办所方针，即“立足中国西南，辐射东南亚和喜马拉雅，在植物学、植物化学和植物资源发掘、利用和保育等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生物多样性保育、生物资源持续利用和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当是我们践行所训的新义。在研究所历史上历次具有标志意义的节点上，延传着“利用植物资源造福于民”的建所初心。

回顾研究所80年历史，要勇于担当尽责。80年来，昆明植物所的发展始终与国家重大需求紧密结合。20世纪40年代，引种美烟大金元，试种栽培证明适生性，培育优质种苗，助力云南烟草业发展。20世纪50年代积极投身橡胶宜林地考察，确定橡胶种植适宜区，为橡胶种植业发展奠定基础。提出建立“自然保护区”和“种质资源库”建议，为国家部署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提供前瞻性、战略性良策。编研《中国植物志》、*Flora of China*、《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中国种子植物科属总论》《种子植物分类区类型及其起源和分化》等专著，弄清国家植物家底，为植物资源持续利用打下科学基础。解决了天麻人工栽培、研制“宫血宁”、“豆腐果苷”、“青阳参”、“天麻素”、“草乌甲素”、“鞘蕊花”、“复方SH”、“奥生乐赛特”、“灯台叶碱”、“芬克罗酮”等一批植物新药，为国家天然药物发展及产业化做出重要贡献。建成“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率先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研究与实践。研究所始终肩负着国家建设的需求，担当着“造福于民”的重任。

回顾研究所80年历史，应尽创新之任。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是攀登科学高峰的必由之路。在创新之路上，我们有过新发现，提出过新观点和新理论，但有过的成绩已成过去，未来的创新任重道远。吴征镒是我们身边能做“冷板凳”、潜心钻研，自主创新的楷模。我们要秉承蔡希陶、吴征镒等老一辈科学家坚持创新不动摇的精神，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在生态文明建设、生物多样性保育、生物资源持续利用和产业发展上做出更多的原创性成果。在迈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今，我们满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在自主创新的新征程中，再立新功，再铸辉煌。

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史》出版之际，是为序。



2018年6月

“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

——贺所八十华诞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语见《枚乘·七发》，文载《昭明文选》。

我曾以此八字为吴老征镒九秩华诞祝寿，文载《科学时报》，2006年7月13日。

昆明植物研究所从1938年筹建，几易其名，时小时大，时大时小。本文统称昆植。

我1958年中秋前来昆植报到，睡在茶花园原云南农林植物所办公室地铺。外墙上有关自授意题写的“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石碑。对此八个字没有考证，后此石碑在文革中不见，大概是“四旧”被扫除了。“文革”后，吴老常讲此八字，但未说典出何处。北京植物所原所长韩兴国考证了出处，我请他们转告吴老，是吴老早知道，还是韩兴国告知吴老后才知道，我没有问，反正我以前不知道。

现所球场旁吴老写了此八字，近来办公大楼前又立了有此八字的石碑，石碑后记中说此八字出自胡步曾主张。我个人意见，没有可能。我想大多数昆植人都不知道胡步曾是谁。胡步曾是胡先骕的字，他曾当过昆植前身云南农林植物所所长十年有余，可以说没有他与关自合作就没有昆植的前身，也就没有今天黑龙潭的昆植，也就没有一大批老植物学家来昆进行植物采集和研究。人不能忘本，科学家是人，能忘本吗？

有两本介绍胡先骕的书：一本是薛攀皋写的《科苑前尘往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7月），书中有两篇介绍胡先骕的文章，我建议大家看此二文，总共有14页。另一篇是胡宗刚写的《不该遗忘的胡先骕》，全书约16万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值得一看！

胡先骕博士（1894—1968）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植物学奠基者之一。他不仅在植物分类，在经济植物、植物园建设（庐山）、古生物学、静生生物所创建（与秉志合作）、云南农林植物所筹建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其一生著作近20部，论文140余篇。同时他还是古文、古诗词大家，像他这么好的古文功底，今日之中国读文科的学生可能也不多。以1962年胡著《水杉歌》长诗而言，当时未加标点，恐怕没有几人能读懂，反正我是读不懂。秉志建议寄陈毅副总理，经陈毅推荐，交《人民日报》1962年2月17日发表，若非如此，我想没有哪家报刊愿登。

我不想介绍胡的门生故旧时对他的评价和学术成就，我仅介绍毛主席的评价和周总理对胡的看法和处理。

195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发言中介绍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时，谈到不久前对批判胡先骕一事（可参看薛著），毛主席插话“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另一位与会者插话“胡先骕批判李森科是对的，后来苏联也批李森科。”，毛主席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陆答：“不是，没有给。（那时是聘任制）”，毛主席又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周恩来总理随即于1956年5月1日找科学院负责人强调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应该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家都要这样。”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到胡老家中代表有关方面向胡老道歉。

阴差阳错，胡到死也只是前中研院院士，而与中科院学部委员无缘。

我还想补充的是，1949年1月16日傅作义将军举行餐会，邀请在北平的学者名流徐悲鸿、胡先骕等20余人参加。胡与参会人士劝傅作义采取和平解放。此点应该肯定。

1959年初，科学院裴丽生秘书长主持召开了植物学工作会议，蔡希陶和浦代英带我参加。会议讨论的一个议题是粮食多了怎么办？（后来知道这是一个以粮食放卫星的大错特错的夸大数字为前提的伪命题）大家的意见是搞大地园林化，真可笑，提出了一个现在才大搞的任务。会议进行中，有一老人直上主席台，台上人人抢着让座。此人是谁？他就是胡先骕！他坐下就讲，我记着表扬了蔡希陶。我一生只见过胡老这一次。上面写的都是抄别人的，抄错了我不负责。文革中胡老被批斗、抄家达六七次，不忍再写其惨状，1968年7月18日被迫害致死。

吴老征铤的成就除《科学时报》我写的那篇文章外，还应吕春朝邀请写过一些，本文就不再写了。

我想着重介绍蔡老希陶的事，我在纪念他逝世10周年文集中写过一篇，没有多少人看过。他常说“他要把文章写在大地上”，的确如此。现在黑龙潭昆植知道他的人已经很少了。

蔡希陶（1911年4月10日—1981年3月9日），字侃如，出生于浙江东阳蔡家村，蔡家是名门旺族。父亲留日学医，归国业医。大姐蔡葵在金陵女大毕业后，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教育硕士学位。后与中国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结婚。蔡希陶两岁时随家迁杭州，他在杭读小学和中学。1929—1930年入上海光华大学物理系，不到两年离光华到北平私立静生生物调查所，在胡先骕先生领导下工作。1932年2月，蔡老赴滇考察，胡老在给云南省主席龙云的信中请求保护蔡希陶率领的赴滇生物调查团。蔡在宜宾找到连父母姓名也不知道的邱炳云，在凉山时，还和彝族统领喝过鸡血酒。平安到昆后，蔡曾致信当时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信全文保存于浙江东阳文史资料。蔡希

陶史料专辑)。

1938年5月，蔡老根据胡老与龚自知书信联系妥当的情况，就合作建云南农林植物所一事拜访龚。龚让蔡老选址，蔡选定黑龙潭。此时是抗战初期，胡老和私立静生生物所仍能在北平勉强生存。当他知道与云南合作有希望时，胡老秘密来昆签订合同，自任所长，旋即回北平。

1940年1月25日，省教育厅拨款2万余元筹划建造的农林植物所办公室竣工，墙上镶了有“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八字的大理石碑，石碑不大，我1958年到所时见过此碑，估计约70×40公分。近查“原本山川”别人也用过，光绪十一年六月合肥张绍棠为重刻《本草纲目》作序时就用过。龚出了那么多钱，文化也高，是有权题字的，何况1940年，胡老不在昆明。

蔡老是我见过的科学家中本事最大的人物之一。抗日时的农林所那栋办公楼旁还有烤烟房和周总理参观过的小温室，可惜现已不在。蔡老埋了部分骨灰的水杉和碑还在。现在一进昆植所就可见有三幢大楼：所办、当时植化和后来的生理楼，这些都是蔡老要钱盖的，门口的五棵大龙柏也是蔡老带人栽的。西双版纳勐仑植物园从选址到建楼、建园，蔡老有头功。可以这样说，昆植能有今天，勐仑植物园能有今天，要是没有当初的实验室、办公室和住所，谁还愿意来，又怎能由小变大。蔡老一心为公，但家庭和个人生活却十分清贫。他和夫人向仲曾在昆明福照街开过鹦鹉店。我去城里如意巷蔡老家几次，见过向老师，鹦鹉店我未见。向仲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向达教授的妹妹，向达在西南联大时著《蛮书校注》，顺便指出《蛮书》作者樊绰（唐）未来过云南。樊在863年撰写了“茶出银生城界诸山”仅比《茶经》作者陆羽（733—780年）晚80年。

为了维持农林所，蔡老还饲养过骡马为人驮运，赚点小钱。他亲自告诉我，他让邱炳云等几位工人种蔬菜，种反季菜。他带邱等挑着菜到陈纳德的飞虎队卖菜。蔡会讲英文，能卖个好价钱。蔡老创业的成就，我认为在同时代人中是不多的。

蔡希陶1956年10月1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他就以他人不敢想也不敢做的勇气和魄力延揽了各个级别的人才。他和彭加木同志到昆明师范学院请了留美的错划为右派的蔡宪元到由蔡老兼任组长的资源化学组工作，主要从事樟油等芳香植物化学研究（用化学方法，与现在完全不同）。我1958年到所后，也认为蔡宪元是一件冤案，他的大儿子是中共党员（后为昆工校长），大儿媳和女儿也是党员，小儿子是团员，他为什么要反党？我和他关系好，“文革”中包庇右派成了我的一个罪名。他“文革”后期逝世，处理后事所里让我操办，开追悼会，我还为当时革委会主任写了一篇通俗悼词，并被宣读，我算是积了点德。

1958年秋，蔡老还招收一批因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高中生到我所工作。我所在的资化组就有5人，全所约有十余人，另外还从云南农大吸收了仅读两年就算大学毕业的学生，可能有六七人。至于应届大学生，1957年至1958年有十余人。研究所一下

子有近百人。

蔡老除了盖房、引人，他本人在科学研究上做了什么？有人介绍了，在他逝世10周年还有一本纪念文集，他的许多门生故旧写了不少，我也写了一篇，文集中也登了他发表的科研论文，大家有空不妨一读。

我这里补充两件事，一是引种美国费吉尼亚烤烟大金元（Mammoth - Gold）种子。众所周知，云南种鸦片很多也很有名，国内称“云土”。当时云南政府想引进优良烤烟代替鸦片种植，烟草良种多次引种，却以失败告终，后由与胡老齐名的陈焕镛先生寄来种子，时为1945年。

1975年，我在弥勒进行中草药调查，有幸认识当时玉溪烟科所顾问杨隆兴老先生，他说，30年代末至40年代，他们认为云南种烤烟有前景，但品种不好，于是成立云南烟草推广委员会，这也迎合当时政府要求。杨隆兴任总干事，蔡希陶任干事，因为烟草推广是空架子，没有土地，而蔡在黑龙潭有土地，故由蔡等试种并取得成功。地不够，蔡老还在所对面落索坡租地种。“文革”前，邱炳云告诉我，当时江川农民用小推车推着大米来换一小袋烟种。云南烟草产业有今天，蔡老等有头功。

第二件事，蔡希陶按云南农林所通知，于1951年2月28日，代表中科院植物所昆明工作站接收到刘幼堂捐献的瓦窑村地产及植物园（主要收集的是各种云南山茶花品种）。因为那时刘成分高，此事需要呈报中科院批准，据知吴老征镒帮了忙。我所云南山茶花有这样多品种，国人之幸，蔡、吴、刘有功。

这里我还想介绍，蔡老还是中国作家协会早期会员，他写过短篇小说和散文，《蔡希陶纪念文集》收录五篇。他的文学才能据说得到鲁迅赞同。一次，陈望道请鲁迅吃饭，蔡希陶在场，夸几句符合常理。蔡老的文学爱好还带来“文祸”。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学习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冒死上谏的精神（以上完全照抄201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下册）。该书在此段文字下有小注：“吴晗是北京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吴晗在毛泽东讲话后，在胡乔木的约请下，开始写海瑞的文章。后又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之约，于1960年底写成海瑞的剧本。该剧原名《海瑞》，后接受别人意见，以区别其他海瑞戏，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年1月在北京首演”。1965年，上海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下了结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罢官”二字正是吴晗接受别人意见加上的，此别人就是吴晗的小同乡蔡希陶。大字报铺天盖地，都是吴晗画龙，蔡希陶点睛。当时，吴晗邀请蔡吃饭，蔡写信给吴晗和吴晗夫人袁震的信都不是秘密了，或者说是公开的秘密……对这一冤案，我不忍再写了。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此“革命”长达十年之久，党和人民从中吸取了教训，下定决心改革开放。纪念蔡老的文章很多，我觉得还要写吴晗传，可能已有，我不知道。

蔡老夫人向仲早逝，后续娶我所分类室黄蜀琼女士。黄蜀琼善诗词，现选半首。悼希陶（调寄江城子）：“忽邀撰稿纪平生，梦难成，泪长倾。泉下能知，应惑身后名。且喜新植成绿海，当睡稳，慰天灵。”

我1958年中秋前夕来昆植，至今已近六十年。当年在所里工作的老一辈都走了，同辈的大半也走了，比我年轻的走的也不少。我也是久病延年，说走就走的人。时代剧变，越变越新，人世沧桑，新胜于旧。来所近六十，七扣八扣，例如“文革”“四清”，非业务性出差，加上六七十年代过多的政治学习占去很多时间，我做行政，科研估计也就是四十二三年。光阴飞逝，徒呼奈何。

行政工作，主要有三：

当年，我向科学院要过两次钱。一次要钱，买了蒜村130亩地，就是现在的木兰园和原来的花卉工厂，厂现已盖实验楼和办公楼。还要钱盖了宿舍大楼和老招待所，我未做具体工作，实际工作都是王守正高工做的。

1963年初所里开了一次所务扩大会议，那时吴和蔡在治所方针上有小的分歧，吴主张半杆子，即一项任务，我所只做我所相关学科能做的研究，蔡主张一杆子，一项任务全所各学科都上，做到试选推广。所领导的另两位，晋绍武是书记，按规是班长，浦代英是主管行政副所长，都是老红军，他们也有分歧，我和每位领导关系都可以，就指定我为会议秘书，我又请武素功和杨崇仁作记录，我则居中协调。吴作了“三个战场，八大兵种”的口头发言，蔡作了植物资源综合利用和保护的发言，会议开得热烈，讨论也很自由，会议开了十来天。我用了一天一晚的时间写成了会议纪要，所领导一致通过，由吴老宣读，“文革”中此“纪要”从所档案中取出，造反派说是办所的“黑纲领”，批斗中吴老承担了责任，他说“纪要不是我写的，但我是同意的，纪要是我宣读的，我负责”，我起草的纪要是这样写的：“我所要在毛泽东光辉思想照耀下，形成花开三带，果结八方，群芳争艳，万紫千红的局面”。植化室造反派批斗我，我说我不是写了要在毛泽东光辉思想照耀下吗？批判者说，那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自问没有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本领。

1989年4月6日，五四青年节前夕，北京传来一些错误消息，于是我召集青年人开会，我说上街不行，其他均可以，他们说去澄江，我问要多少钱，他们说500元，我说不够，带1000元。我随即用电话请澄江县领导准备了丰盛的午餐，青年们玩得高兴，吃得高兴，就这样过了那年的五四。五四后，5月8日，我由北京转赴中科院青岛疗养院，享受平生唯一的一次疗养。5月28日我由青飞沪，再转南京，和时任中国药科大学校长尹宗靖交换看法，6月1日由南京飞昆，在家休息两天，实际未休息，了解所情。6月5日，我去所部召集中层干部宣布6条纪律，主要是从即日起不准再参加社会上任何活动，外面传来的“宣传品”，要一撕二堵，因为个别“文革”中受害的人，在“宣传品”上写了一些我认为不好的话，以撕去为好，个别人也讲了我认为不该讲的话。我召开了一

次全所青年大会，我作了约一个半小时的口头发言，大意是以我参加过学生运动的经历，说我是过来人，经历过风风雨雨，而你们可要警惕啊！我只是保护了青年，因为我知道保护和教育青年是我党的一贯方针。

关于科研工作，从大的方面看我做了三件事，首先是为研究所创造了科研条件，当时还是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一切的时候，我和李楠（时任我所物资处长，现离休回广东）通过一个姓阴同志向革委会生产组组长要外汇买了一台 Bruker FT-90 带傅里叶变换的核磁共振仪，当时是全国两台之一。此事得到了老首长省革委会文卫组副组长刘希玲的大力支持，阴同志的名字是一个不该忘而又忘记的名字。后来方毅副总理来所我向他要了一台色质联用仪。

其次，是我国较早可能也是我院最早进行了国际合作。先是与日本大鹏药厂合作，因为我和北京中科院生物局宋振能通电话，得到授权。我所派孙汉董、杨崇仁去德岛和广岛两所大学读学位，大鹏出钱。后来，和日本涌永药厂，特别是和日本山之内药厂合作，我所得到了几百万美元，买了更先进的仪器，大型质谱，先进红外仪，日本津村药厂和德国拜耳药厂的合作也是成功的。通过合作培养了植化室骨干，实验条件得到大大改善，我个人的作用仅是开了头。

再次，植化室由院开放室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也起到了点作用。

我做的科研工作，主要有植物化学类：如山毛榉科（现名壳斗科）、人参属等在基础和应用上都有意义，贾良智和我共同主编《中国油脂植物》。在天然药物方面搞了四个药，如人工合成天麻素、血塞通（我和伍明珠仅做了三七根的化学工作）、宫血宁（陈昌祥化学工作）、秋水仙碱（国产资源及化学），发表论文 300 多篇。我多次声明，我的科研工作都不是我一个人做的，现再次声明一次。

我年已八十有六了，写东西很吃力，幸逢八十所庆，书此致贺。漫漫修长路，求索无尽时。国逢新时代，所庆八十载，龙潭群星灿，宝山万花开。

周 俊

2018 年春于昆明

昆明植物所 80 华诞随想

1962 年，我毕业于云南大学化学系有机合成专业，有幸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转瞬来所已 56 年。时逢建所 80 周年之际，回顾 50 多年的变化，展望未来，对我所的发展充满了无限希望。

八十年来，昆明植物所在昆明北郊元宝山这块宝地上，人事、名称和体制几经周折和变化，学科由先前的植物分类学，植物资源化学，植物生理学，植物园等发展成为了对植物的认识上从宏观到微观，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到保护的综合性现代化植物学研究所，在不少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与好评，令人高兴，可喜可贺。

在 80 华诞之际，老一辈植物学家胡先骕等与云南省合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蔡希陶等领导昆明工作站，吴征镒、蔡希陶等创建昆明植物研究所，他们的历史功绩、治学风范、崇高品德我们应永远铭记心间。

改革开放 40 年来，尤其是近 10 多年，我所在学科的凝练，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研究平台的建设等方面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员结构，副高职以上的研究人员占到了全所科研人员的 80% 以上，且大部都有在国外学习和研究的经历；每年承担国家和云南省的研究项目，按人均计在省里名列前茅；每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按人均计不仅在省内、在中科院生物类研究所中也位于前列；一批研究成果为国家和云南省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也为科技界指明了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我们应努力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的要求，推进“一三五”特色研究所科技发展规划、创新团队和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项成果的产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我们的贡献。

认识、合理利用和保护我国西部和云南植物资源，推动植物学科的发展，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这就是我所的初心和始终。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不忘我所的使命，奋勇向前，是我们应当不断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云南和我国西部植物资源，尤其是云南拥有我国近 60% 的、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的两万余种丰富多彩的植物资源，是我们的优势。历经几代科技工作者孜

孜不倦、奋发努力地探索，已有了相当的建树。但由于过去研究平台和条件所限，在植物的起源和进化上，尤其是对植物次生代谢成分及其生物功能的认识上，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大量的奥秘需要我们去发掘、去探索。

当今是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以蛋白质组学、基因组学等多种组学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大大加速了人们对生命科学的认识和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网络信息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认知和创新能力。因此，我们在各自从事的专业领域中，不仅要在所内和本学科内广泛开展交流与合作，同时还要与其它学科交叉融合，这样才能更好地去探索深层次的问题，才能追根溯源地把“科学故事”逐步讲好，讲清楚，推动植物学科方方面面向前发展。同时，我们必须时刻关注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但不管任何时候，始终不能忘了我所的研究战略目标与方向任务，始终不能忘了我们的专业技术是什么，练好基本功。世界上没有万能的科学家。一个人要在科学上留下点印迹，必须穷一辈子之功，任何“投机取巧”，走捷径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因为社会和科学的分工，每个单位、每个专业和每个人都在承载着自己的职责，努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科学不可能是同质化的。

研究所的发展决定于在各个层面上有没有担当的人才。在各个学科中如何培养一个个有特色的、能“战斗”的研究团组，除了他们自身的奋发努力之外，与所、室的关注、支持与培育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当政者”应承担的责任。各个团组好了，研究室才能好，研究所才能立得住、站得稳，才有存在的价值，才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就不怕“日子”过不下去。

研究组要兴旺，有特色，就要有好的理念。领班人的德行极其重要，“能力有大小，人品更重要”。有了方向、目标和任务，领班人要有胸怀，如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如何想问题、找问题、解决问题？只要付出了，就会有产出，有收获。

令人欣慰的是，昆明植物所在一些学科领域中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只要我们紧紧跟上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步伐，刻苦努力，团结奋斗，昆明植物所必将成为学术氛围风清气正，人人爱所，和谐团结，欣欣向荣，出人才出成果的研究所；必将有更多的研究领域从跟跑走向并跑和领跑的学术地位，有更多的科研成果服务于社会，为中华复兴作出更大地贡献。

以上是我来所 50 多年来的一点浅薄的体会，并以此作为建所 80 华诞纪念的序文之一。

孙汉董
于戊戌年春

“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的抚今追昔

1959年，我在昆明植物园工作时，见到在茶花园里的一幢数十平方米平房前面的墙上，嵌着一块刻有“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古训的石板，以志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前身“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在1940年所建新屋的落成。当时我对古训的含义一知半解。随着对植物的认知，我才理解那个古训告诉我们，生长在山川的草木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所离不开的自然资源。

至今，昆明植物所已走过了80个年头。该所与时俱进地对“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的理解而开展了植物的科学研究。通过对山川草木的采集，揭开了云南这个举世闻名的“植物王国”的面纱；通过研究，出版了《云南植物志》等诸多论著，让世人见其真面目，还取得了诸如《被子植物的一个“多系-多期-多域”新分类系统总览》等一系列的创新成果。建立了多学科的科研手段，在“原本山川”中发掘了一批又一批的重要“極命草木”，为我国和地方在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资源，并发展了植物资源化学、植物生理学和民族植物学等学科。

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顺应了世界兴起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新潮流，昆明植物所又挑起了“抢救植物就是拯救人类本身”的历史新重担。在原有的昆明植物园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基础上，又先后建立了丽江高山植物园和我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迁地保存了数以万计的植物种类及其种质，并在保护生物学研究上获得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令人瞩目的创新成果，为“極命草木”的有效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当前，一座由中科院和昆明市共建的“国家植物博物馆”也正在筹措中。它的建设将以云南的“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为基础，其建成将使昆明植物所的植物科学知识和植物文化的继承与弘扬等功能更上一层楼。

本人已在云南对“草木”进行了长达一甲子的科学研究。在此期间曾先后两度在昆明植物所工作。在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中，不能说没有被“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古训的感应。抚今追昔，我相信，这八个字不仅已成为昆明植物所科学研究的灵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积淀，它将升华为该所的植物科学文化，代代相承。

许再富

2018年春于昆明

我所跨世纪之初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二三事

我的所长任期正好与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启动和Ⅱ期阶段创新试点的时间吻合。在昆明植物所发展壮大的八十年里，这段历程并不算长，但却是难以遗忘的一页。说来也巧，我们这一辈人由于生长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我国科研学术领域并不完整的一代人，但历史却赋予了我们在昆明植物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要担当特殊的使命，那就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其表现形式就是“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实施。

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决策，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昆明植物研究所正值新老交替、面临跨世纪的转折时期，作为“知识创新工程”的第一批试点单位，经过启动阶段和Ⅱ期创新试点阶段的实施，深刻地影响了我所在跨世纪之际的学科凝练、队伍建设、平台建设以及体制机制创新，也为后来的Ⅲ期全面推进阶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所各项科研工作的立足点是植物资源，以吴征镒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经过六十年的艰辛努力，在植物分类与植物区系地理、植物化学、植物生理、民族植物学等学科领域形成了自身研究特色和优势。在“知识创新工程”启动之初，我们领导班子对研究所的研究定位还没有很好地认识和理解。记得当时院党组提出了国家发展战略、学科领域前沿、自身研究特色的“三要素”的发展策略，即三要素可以视为三个环，三环相互重叠是最理想的定位，如果只有两环相交，如国家发展战略与学科前沿、或国家发展战略与自身特色、或学科前沿与自身特色，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一个研究所的定位只具备一个要素，尤其是只具备自身特色一个要素，则是不可取的，这样的研究所是要被淘汰的！这一原则对于我们震动很大。“知识创新工程”启动的首要问题就是学科凝练，经过领导班子和全所职工的反复研讨，确定了具备上述三要素的“植物资源和植物物种多样性及其可持续发展”作为我所的研究定位，并进行了优势学科、重点研究领域、学科新的生长点部署，完成了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请论证与验收、中科院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的论证与批准；启动了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设、丽江高山植物园的共建、云南花卉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的共建等一批影响我所长远发展格局的项目。

世纪交替之际也是我所科技队伍处于代际转移的关键时期，与其他研究所一样，科研队伍尤其是学术带头人存在较严重的“断层现象”。基于我所年轻学者“资历”和“能力”不对称、不匹配的现实情况下，如何填补这种人才断层的鸿沟？通过“知识创

新工程”启动阶段人事制度的改革，领导班子达成共识，在充分发挥老一代科学家在学科领域中的领头作用的同时，坚定不移花大气力抓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将职称评定向年轻人倾斜，逐步实现了研究员队伍的年轻化、高学历化、多学科化，使研究所的科研人才队伍顺利实现了代际转移。回想起来，当初没有老领导、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帮助，是很难实现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的。

“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另一个新举措是在全所范围内科研、管理、支撑系统第一次实施了“按需设岗、按岗聘用、分级管理、竞争上岗”的用人机制以及考核和动态管理的模式；制定和实施了岗位津贴和绩效奖励工资制、科研成果奖励制、管理和支撑系统的岗位津贴和绩效津贴与一线科研绩效挂钩的办法，提高了科研、管理、支撑三大系统有机联系、促进了研究所出人才、出成果的极大热情和氛围。这在今天已经形成了常态化和制度化，而在当时，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和理念中迈出这一步很不容易！由于传统观念的转变需要有磨合期，加上我们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有待调整和完善，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矛盾。好在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理解和支持，让我们在矛盾中寻求解决、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知识创新工程”的实施，给我所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在国家和省级重要奖项、专著出版、SCI 学术论文、新药创制、花卉新品种等科研成果方面有了极大改观。在此期间，我所又增加了2名中科院院士、新增4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形成了以老科学家领衔、一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持续奋进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克服资金短缺的困难，抓住机会实施研究所园区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和改扩建，涵盖了我所实验楼、植物园、办公楼、标本馆、图书馆、客座公寓、后勤服务中心等，也是我所“知识创新工程”实施的亮点之一。借昆明植物所八十诞辰之际，我要向在此期间同舟共济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以及研究所广大职工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郝小江

2018年春于昆明